

语言生活研究与中国语言学的历史使命*

李宇明

(北京语言大学 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语言科学院, 北京 100083)

[摘要] 文章讨论中国语言生活研究的理念与成果, 认为解决社会发展中的语言问题应作为语言学研究的出发点、验证处和归宿地, 提倡到田野、社会、实验室、互联网上去调查语言现象, 去发现、研究和解决语言问题。语言学要关注、吸收、整合相关学科对语言的研究, 并为科学共同体做出贡献。社会建立并支持学科发展, 是为了更好解决社会发展中的问题, 社会的学科评价是强有力的指挥棒, 但“五唯”之类的非科学评价会给学科发展带来极大副作用, 会诱导人片面追求“科研GDP”而忘却学术真谛。评价学科与学人, 主要应看其提出、解决了什么问题, 应看其研究对本学科的学术提升力、对相关学科的学术穿透力和对社会发展的学术推进力。中国语言生活有其独特的中华特点, 中国语言学身负重要的历史使命。我们已经在有些领域走在了世界前列。以中国语言生活为研究对象, 以改善中国语言生活为研究目标, 相信可以发展出更多原创性的概念、理念、理论和研究范式, 繁荣中国的语言科学, 推进社会进步。

[关键词] 语言生活; 语言学使命; 学科评价; 学术原创

[中图分类号] H00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5639(2023)01-0001-13

DOI: 10.14091/j.cnki.kmxyxb.2023.01.001

中国一批研究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学者, 20年来重视对语言生活的研究, 提出了一些原创性的概念和理念, 提升了语言规划学的学科品位, 得到了国际同行的密切关注和积极评价; 而且, 这些研究也为国家的语言规划提供了坚实的学术支撑, 推动了国家语言事业的发展, 为人民富裕、国家强盛, 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语言学贡献。

本文梳理语言生活理念的萌生与发展历程, 论述社会发展、学科廓定、学科评价中语言学的3类问题, 提倡到田野、社会、实验室和互联网上去发现和解决语言问题; 最后提出, 在全球视野下, 中国语言生活具有许多独特性, 在一些领域一些方面还具有先进性。中国语言学身负重要的历史使命。我们已经在有些领域走在了世界前列; 以中国语言生活为研究对象, 以改善中国语言生活为研究目标, 相信可以发展出更多原创性的概念、理念、理论和研究范式, 繁荣中国的语言科学, 推进社会进步。

一、语言生活

“语言生活”这个术语可以溯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日本。特别是1951年, 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创办了《言语生活》月刊(1988年停刊), 也开始出版《言语生活之实态》的语言调查报告。^①日语的“言语”相当于汉语的“语言”, 依照当时日本学者的理解, “言语生活”可指人类语言交流的所有问题。人们的生活有衣食住行, 在不同生活场景中需要不同的语言交际, 加起来就是语言生活。

(一) 中国语言生活的研究概览

据笔者所见, 中国最早使用“语言生活”的文献是1955年罗常培、吕叔湘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②。当

* **[作者简介]** 李宇明, 男, 河南泌阳人,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郑州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同济大学兼职教授, 研究方向为语法学、儿童语言学和语言规划学。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语言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19VXK06);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两个一百年’背景下的语言国情调查与语言规划研究”(21&ZD289); 北京语言大学校级重大专项“中国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学术史研究”(21ZDJ04)。

① 感谢刘海燕教授提供日本的有关材料。

② 罗常培, 吕叔湘. 现代汉语规范问题 [A]. 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 [G].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6.

时使用带有引号,表明“语言生活”还是一个比附性用法,是个临时性的新词语。之后很少见人使用,使用时也是“语言生活、语文生活”交替互用。如:周有光《语言生活的现代化》(1979)、《我看日本的语文生活》(1986)、《语言生活的五个里程碑》(1989)^①,陈章太《论语言生活的双语制》(1989)、《四代同堂的语言生活——陈延年一家语言使用的初步考察》(1990)、《语文生活调查刍议》(1994)、《再论语言生活调查》(1999)。眸子1997年发表《语言生活与精神文明》^②,文章不长,但被认为是对语言生活做出了基础性定义。^③

“语言生活”广泛使用并成为中国语言规划的基本概念,是2005年之后。2005年,国家语委组编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俗称“绿皮书”)开始出版,它是关于中国语言生活的年度报告,已经持续出版了17年。以绿皮书为“学术底盘”,相继形成了反映中国语言生活的九大“皮书方阵”^④:2015年~2017年,《中国语言政策研究报告》(俗称“蓝皮书”)、《世界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俗称“黄皮书”)、《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报告》(俗称“白皮书”)次第创办,国家语委这四大皮书年年发布,从不同角度展示中国与世界的语言生活及其研究状况;2016年《北京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出版,2018年《广州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出版,2020年《上海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出版,京穗沪三市皮书不定期出版,展示我国大都市的语言生活景观;2020年,《中国语言服务发展报告》出版,这是我国首部领域语言生活皮书;2021年,《粤港澳大湾区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出版,这是我国首部跨区域的语言生活皮书。

与“皮书方阵”同行互助的,是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对语言生活的研究。2004年,“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正式成立,逐渐建起平面媒体、有声媒体、网络媒体、教材、民族语言、华语、开发应用等分中心,用动态流通语料库的理念和方法^⑤,对主要领域的语言生活进行长期的监测研究,并不断发布监测数据。发布方式除了撰写咨询报告和学术论著论文之外,还有教育部每年一次的关于中国语言生活状况的新闻发布会、作为绿皮书的年度内容之一的“汉语盘点”活动。

“汉语盘点”活动是2006年由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和商务印书馆联袂发起的,其宗旨是让网民用一个字、一个词描述当年的中国与世界,借以体验汉字汉语魅力、复盘社会变迁、关心国家与世界。在汉语盘点之时,还发布当年的新词语、媒体十大流行语、网络十大流行语;这些“三语”数据是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对报纸、广播、网络语言情况统计分析的成果。十余年来,“汉语盘点”形成了一个品牌,甚至是“文化年俗”,由之引发了中国报纸杂志在年终岁尾用字词的方式来梳理、评点当年要事的风气。“汉语盘点”用它特有的方式向社会报告语言生活情况,自己也成为语言生活的组成部分。

语言生活的重要研究和实践还有许多,例如:利用网络技术监测语言舆情,跟踪研究语言生活热点,预防或减缓语言冲突;^⑥2008年国家语委启动的“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和2015年启动的“中

① 罗天华,等.周有光年谱[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

② 眸子.语言生活与精神文明[J].语文建设,1997,(1):39-41.

③ 郭熙.《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十年[J].语言文字应用,2015,(3):2-11.

④ 李宇明.关于《中国语言生活绿皮书》[J].语言文字应用,2007,(1):12-19;郭熙.《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十年,语言文字应用,2015,(3):2-11;苏新春,刘锐.皮书的语言使用与语言特色[J].语言文字应用,2015,(3):22-32;李宇明.中国的语言生活皮书新阵容——序《广州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8)》[A].屈哨兵.广州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8)[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⑤ 动态流通语料库理论是第三代语料库研究的基本理论。它以“流通度”和“语感”为出发点,通过对语言现象的“流通度”的计算,让计算机模拟和量化人们的语感,从而揭示语言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为语言知识的动态更新开辟可操作的途径。参见隋岩.动态流通语料库理论的概念和方法[J].语言文字应用,2000,(2):50-57;张普.动态语言知识更新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⑥ 魏晖.语言舆情与语言政策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赵世举.中国语言观测研究的实践及思考[J].语言战略研究,2016,(5):72-81.

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具有对中国汉语方言和民族语言情况的普查作用；2016年以来全力开展的“语言扶贫”工作，对西部地区、民族地区的语言状况有了深层了解；《全球华语词典》《全球华语大词典》^①的编写和“全球华语语法研究”^②“海外华语资源库建设”^③等项目的设立，有助于全面深入了解海外华人的语言生活状况。

（二）语言生活理念

几十年来，特别是近二十年来，通过语言生活皮书系列的编写、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的监测研究及其他一些重大语言规划行动、语言项目的开展，运用数据的和经验的多种方法手段，对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有了全方位的深入了解。在了解的过程中也推进了中国语言生活的进步，并凝练出关于语言生活的一些学术理念。

李宇明在《语言生活与语言生活研究》^④一文中，根据半个多世纪关于语言生活的研究，根据近20年语言生活的发展变化，将语言生活定义为“运用、学习和研究语言文字、语言知识和语言技术的各种活动。”这一定义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把语言学习、语言研究纳入语言生活范畴，过去基本上只考虑语言运用；第二，“运用、学习、研究”的对象不仅是“语言文字”，也包括“语言文字知识”和“语言技术”，凸显了数字时代“语言文字知识”和“语言技术”在语言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语言规划（语言管理、语言治理）的对象严格来说不是语言与文字本身，而是语言生活；即使在语言规划中涉及语言与文字的规范等，也是因为语言生活的需要。国家语言文字工作不只是“话怎么说、字怎么写”的工作，而是关于语言生活的工作。语言规划学就是要关注语言生活，解决语言生活问题，满足语言生活需求，引导语言生活发展。语言生活有哪些问题与需求？什么是理想的语言生活？引导语言生活向何处发展？就成为语言规划要回答的问题。在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中国学者逐渐形成了五个与语言生活相关的重要理念：^⑤

第一，构建和谐语言生活。中国的语言生活十分复杂，妥善处理语言关系，包括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简化字与繁体字的关系、国家通用语言与民族语言的关系、本土语言与外语的关系、国内汉语与海外华语的关系等。构建以国家通用语言为主导的多语并存共用的和谐生活，通过语言生活的和谐促进社会生活的和谐，逐渐成为共识，并发展为新时期国家语言规划的工作目标。

第二，提升语言能力。语言能力是过好语言生活的能力。提升个人语言能力，就是培养“多言多语”人。自幼掌握方言和民族语言，深扎文化之根；入学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还要掌握一两门外语，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贡献力量。国家语言能力是国家处理海内外事务所需要的语言能力。中国的发展应具有20/200的语种能力，具有在行政、外事、军事安全、新闻舆论、科技教育、经济贸易等领域的话语能力。^⑥

第三，保护和开发语言资源。语言如同水、矿产、森林、旅游等是国家的重要资源，需要保护和开发利用。语言资源是文化资源，保存着人类旧日的世界图景。语言资源是语言教育的基础，特别是外语教育、国际中文教育和线上语言教育的基础。信息化时代，语言资源帮助计算机进行信息加工，“饲养”

① 李宇明. 全球华语词典 [Z].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李宇明. 全球华语大词典 [Z].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后者获得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图书奖。

② 邢福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球华语语法研究”（11&ZD128）。见邢福义，汪国胜. 全球华语语法研究的基本构想 [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6）：1-7.

③ 郭熙主持，北京语言大学高精尖创新中心2017年重大项目。

④ 李宇明. 语言生活与语言生活研究 [J]. 语言战略研究，2016，（3）：15-23.

⑤ 李宇明. 语言规划学说略 [J]. 辞书研究，2022，（1）：1-17 + 125.

⑥ 李宇明. 试论个人语言能力和国家语言能力 [J]. 语言文字应用，2021，（3）：2-16；魏晖. 国家语言能力有关问题探讨 [J]. 语言文字应用，2015，（4）：35-43；文秋芳，张天伟. 国家语言能力理论体系构建研究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计算机获取语言智能。数字经济的关键生产要素是数据,语言资源是重要数据,具有生产力的性质。^①

第四,全面精准开展语言服务。语言服务是利用语言(包括文字)、语言知识、语言技术及语言的所有衍生品来满足语言生活的各种需要。在灾难、事故、公共社会卫生事件、社会突发事件等特殊情境下,提供应急语言服务。

第五,构建信息无障碍社会。大力推广国家通用语言,以实现汉语方言区、民族语言地区和特别行政区的信息无障碍沟通。通过精准语言服务,实现与老年人、外来人等信息特殊人群和盲聋等语言障碍者的信息沟通无障碍。通过外文教育和海外华文教育、国际中文教育等,方便中外信息沟通。重视人的信息技术教育,实现人与机器信息沟通无障碍。

(三) 语言生活理念的国际影响

中国语言生活的研究,已经走出国门,得到国际学界的关注,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例如:

以《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为底稿,德古意特出版社与商务印书馆联合出版英文版 *The Language Situation in China*,从2013年开始已经陆续出版6部;《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还相继引入日本、韩国和俄罗斯,有日文版、韩文版和俄文版。德古意特出版社还出版了李宇明 *Language Planning in China* (《中国语言规划》2015)、周庆生 *Ethnic Minority Languages in China: Policy and Practice*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政策与实践》2020)等反映中国语言规划研究的著作。著名语言政策学家斯波斯基对这些著作作序或著文给予高度评价。^②

俄罗斯科学院语言学研究所主办的学术刊物《社会语言学》(*Социоллингвистика, Sociolinguistic Studies*),2020年第3期推出中俄两国学者合作的专刊,刊发了中国学者5篇关于语言生活研究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是近些年发表在《语言战略研究》上的:郭熙《七十年来的中国语言生活》,李宇明《中国语言资源的理念与实践》,刘媛媛、邓飞、赵蓉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英语教育“文化认同”规划研究》,王春辉《语言与贫困的理论与实践》,赵世举《中国语言观测研究的实践及思考》。该刊2021年第4期又译载李宇明的《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的若干思考》(原载《南开语言学刊》2011年第1期)。俄罗斯科学院成立于1724年,是近300年来世界最重要的研究机构之一;语言学研究所是俄罗斯最重要的语言研究机构。

201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中国政府在苏州共同举办“世界语言大会”,主题是语言能力与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发布了《苏州共识》。201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中国在长沙共同举办“世界语言资源保护大会”,发布了《保护和促进世界语言多样性岳麓宣言》。这两个国际大会,是对中国语言生活研究与语言规划实践的认可;这两个会议文件,都融入了中国语言生活研究的成果,是中国智慧做出的国际贡献之一。

类似这样的事例还有不少。这些事例说明中国语言生活及其研究成果越来越受到国际关注,中国语言生活学者“就语言生活为语言生活而研究语言和语言生活”^③的主张是有学术魅力的,是值得坚持和发扬的。

二、语言学的三类问题

在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的过程中,科学得以诞生与发展,学科逐渐建立与完善。学科的建立与完善,是为了更好解决社会发展问题。为了支持和促进学科发展,使其更好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社会也会支持

① 徐大明. 语言资源管理规划及语言资源议题 [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1): 12-15; 张普, 王铁琨. 中国语言资源论丛(一)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王世凯. 语言资源与语言研究 [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9; 李宇明. 中国语言资源的理论与实践 [J]. 语言战略研究, 2019, (3): 16-28; 李宇明. 语言数据是信息时代的生产要素 [N]. 光明日报, 2020-07-04 (12); 冯志伟. 神经网络、深度学习与自然语言处理 [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2): 110-122.

② 例如: 博纳德·斯波斯基. 政府应当管理的是语言生活, 而不是语言本身——序《中国语言规划论》(英文版) [J]. 语言战略研究, 2016, (1): 88-90.

③ 李宇明. 语言生活与语言生活研究 [J]. 语言战略研究, 2016, (3): 15-23.

学科建设。社会支持学科建设的依据是学科评价,通过学科评价明确该支持谁、该如何支持、支持的效果如何等。如此一来,学科和学者就会面临3类问题:1. 社会发展中的问题;2. 学科自身要解决的问题;3. 学科评价问题。如何看待这3类问题,涉及“学科观”;怎样处理这3类问题,影响到学科能否健康发展。这3类问题投射到语言学科上,就形成了语言学的3类问题。^①

(一) 社会语言问题

在人类群体的社会进程中,在人类个体从幼到老的一生历程中,都会遇到诸多语言问题,特别是语言运用、语言技术、语言学习、语言决策、语言意识、语言疾病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统称为社会语言问题。

社会语言问题是学术发展的“本源问题”,是驱动语言学发展的元动力,也是语言学需要专心解决的问题。在学科认识上,首先要将学术注意力放在语言生活中,把社会语言问题看作学术研究的起点;还要将学术研究成果放回语言生活中去检验,放回语言生活中去解决问题,推进语言生活进步。

在研究上有三大关键:第一,要长期深入语言生活,仔细观察语言生活,敏锐发现社会语言问题。第二,要把问题“问题化”,将社会语言问题转化为学术问题。^② 社会语言问题转化为学术问题,首先是把问题与学科曾经处理过的学术问题关联起来,将问题植入到一个相关、相近的学科体系中。一旦把问题纳入一个学科体系,就可以用学术的办法来处理,就可以考虑用什么方法来研究它。社会语言问题往往都是“复杂问题”,原有的学科框架装不下,已有的研究方法不太管用,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学术创造力,更需要学者的忍耐力。因为研究新问题不能“轻车熟路”,可能面临合作者少、立项较难、出成果慢、学界认可度低等困窘,故而需要学者的忍耐力。第三,要用好学术成果。学术成果有内化、外化两大途径。内化途径就是将学术成果“学科化”,用于学科发展,增加学界共识,逐渐成为学科的一个研究方向甚至是分支学科。外化途径是将学术成果放回到语言生活这一“问题来源处”,在那里接受学术检验,在那里发挥解决问题的作用;并在检验成果、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发现语言生活中的新问题,开启新一轮的问题“问题化”历程。

这种由现实问题驱动、将社会问题“问题化”、将学术成果放回社会的学术研究,已经涉及新的学科观,是超出传统的新学术范式,是真正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二) 学科的语言问题

当语言学科(及分支学科)建立之后,就产生了学科问题。学科问题可分为两类:其一,学科框定的语言问题,亦即学科研究对象;其二,为完善学科、发展学科而需要解决的问题,亦即学科建设问题,主要包括学科内部的分支设置、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理论假说、学术范式、学术历史、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等。学科(分支学科)是学术研究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解决学科问题,是为了让学术力量更强大,可以更好地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因此学者致力于语言学科问题研究,是应当受到社会尊重的。但是也应当注意3个问题:

第一,关注社会语言问题。社会语言问题被框定入语言学成为学科研究对象,是在学术史上发生的,当时就不可能将所有社会语言问题全都囊入学科之中,而且语言生活也在不断发展变化,故而语言学家需时时关注语言生活,将需要研究、可以研究的问题及时纳入学科之中。如果学科不能及时关注社会语言问题,一方面社会发展会因一些语言问题没有较好解决而受到影响,另一方面语言学科也可能成为脱离社会的象牙塔,其研究话题远离社会,甚至得不到社会应有的支持,失去与其他学科共情联袂的机遇,陷入“学科孤岛”。

第二,注意吸收相关学科成果。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与认知、信息等也关系密切,因此,语言不

^① 李宇明. 驱动语言学发展的三类问题 [J]. 当代外语研究, 2020, (2): 3-6 + 129.

^② 关于问题的“问题化”,参见李宇明. 语言学研究:问题的“问题化” [J]. 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5): 21-29 + 192.

只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也为诸多学科所关注所研究。心理学、认知科学、神经科学、病理学、哲学、符号学、逻辑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教育学、历史学、地理学、文化学、文学、民俗学、艺术学、新闻学、国际关系、数学、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数据科学等,都在语言研究领域做出过或正做出贡献。这些贡献表现在,或是创新了研究语言的方法、手段、技术,或是揭示了语言某方面的特点、性质、规律,或是开发了语言的某种新功能。语言学应当关注这些学科的语言研究,或借用其研究方法,或借鉴其研究成果,或扩展对语言其他属性的认识,吸收、整合这些学科对语言的研究,才能对语言的面貌有“全面”观照。时至今日,语言学不应当只有语言学家研究语言的成果,而应当包含所有科学对语言的研究。

第三,重视学科交叉。2020年7月29日,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召开。之后不久,交叉学科成为我国的第14个学科门类。2020年11月29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交叉科学高端学术论坛在北京召开,正式成立交叉科学部,这是基金委成立的第9个科学部。这些情况显示,学科交叉已经成为当今科学的普遍现象,是每个学科都必须认真对待的。《语言战略研究》2021年第1期编发了陈平主持的“语言交叉学科”专栏,陈平教授根据学科交叉的紧密程度及交叉结果,把学科交叉分为4个类型:A.多学科同现,如多学科的论文集;B.跨学科,即某学科单向跨出,主要是借用其他学科的工具、观点等;C.交叉学科,学科双向的交叉结合;D.超级学科,学科交叉之后创建新学科。^①语言学自古以来就比较重视学科交叉,中国语言学也是如此,甚至可以说,近40年中国语言学的发展很大一部分源自学科交叉。但是就交叉的紧密程度而言,几乎一直处在陈平所述的A、B两类型,特别是那些“对象学科”似乎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热情。现在许多国家的语言学系或语言学专业,直接设立在计算机学院、网络学院、认知科学院、心理学院、医学院、法学院等,这是学科交叉的新趋势,也是交叉培养语言学人才的新趋势,值得特别关注。

(三) 语言学的学科评价问题

为了使学科更好地解决社会发展问题,为了使学科健康发展,社会对学科会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特别是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②的当下时代,更是如此。社会对学科的支持主要体现在物质的和精神两个方面:第一,提供科研所需要的条件,包括:提供经费,帮助建立研究室、实验室等,支持创办学会、杂志、出版社等以促进学术交流和成果发表,支持研究成果的大面积实验和推广,维护知识产权,支持学术人才的培养等。第二,给予科研工作者及其所在单位以荣誉,包括:学术职称制度,学术人才称号,实验室、学科、学术期刊的等级评定,各种科研奖励,用科学发现、科技产品、大楼、道路、城市、小行星等为科学家命名。

社会支持一般以学科评价为基础,获得良好学术评价者往往可以得到较大的社会支持。为了得到较大支持,学科学人不得不面对第三类问题,即“学科评价问题”。学科评价会受到不同时代、不同学科特点及发展水平、不同历史文化传统、不同管理体制而具有各个国家、各个学科及学科群落的特点,但是尊重科学发展规律是基本准则,推进科学进步是共同目标。当今时代,对语言学科(甚至也包括其他学科)的评价应当着重3点:

第一,对语言学学科的学术提升力。一个优秀的研究者,不是看发多少文章,得多少项目,有什么头衔,而是看提出了、解决了什么样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与解决对于本学科的发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就某种意义而言,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为重要,因为只有战略科学家等“关键少数”才能提出引领学术新潮的问题。

^① 陈平. 语言交叉学科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J]. 语言战略研究, 2021, (1): 13-25.

^② 1988年9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来华访问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同年9月12日,他在听取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初步方案汇报时再次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992年初,他在视察南方时的讲话中也多次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第二，对相关学科的学术穿透力。学科之交若人之交，是双向的而非单向的，不能只做索取者、受益者，还需要做相关学科的贡献者。关注相关学科，了解相关学科，建立交叉学科，才有可能成为相关学科的贡献者。而且科学（包括文科、理工科等）是一个共同体，科学共同体往往会形成一些共同解决的科学问题和社会问题，比如2005年《科学》（*Science*）杂志在其创刊125周年之际公布了125个最具挑战性的科学问题；2021年上海交通大学在建校125周年之际与《科学》杂志又联合发布了125个科学问题，这些问题仔细分析其实也包含有语言问题。提出和回答这些问题是科学共同体的共同义务与责任，每个学科也都应为之做出贡献。一个学科只有具有学术穿透力，才能对其他学科发生影响，才能对科学共同体有所贡献。

第三，对社会发展的学术推进力。推进社会进步是人类发展科学的本原目的，语言生活是语言研究的出发点、验证处和归宿地。所以对语言学的学科评价，还应当看对语言生活的贡献，对社会发展的学术影响。

（四）三类问题的不等式

社会语言问题（A）、学科语言问题（B）和语言学科的学科评价问题（C），这3类问题根据其重要性，理论上应形成不等式Ⅰ）：

$$\text{I) : } A \geq B > C$$

解决社会发展中的语言问题，本来是语言学科建立的本原目的，社会语言问题本来是本源问题，但是当学科建立之后，特别是当学科发展得比较强大时，人们往往会忘却本原目的，忽视甚至轻视本源问题，更有甚者会把AB两类问题对立起来，认为研究学科问题才是学问。语言学界当前也有此种倾向，比较重视学科问题，相对轻视社会语言问题。随手举个例子：我国有文字研究所，但是很少见研究当代汉字的研究所；我国有语言研究所，但是似乎没有普通话研究所；当代汉字和普通话是十几亿人正在使用的语言文字。相对轻视社会语言问题的倾向，在学术“跟跑”的国家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因为这样的国家很少能够设置学术话题、指引学术方向，只能聚精会神地追赶领跑者。而事实是，只有重视对本源问题的研究，跟跑者才不会永远只是“跟跑”，才有机会“弯道超车”，成为领跑者。

现在流行一种说法，叫“服务社会”。服务社会是应当的且应受到尊敬，如果说解决社会问题不是学术的本职，是一种身有余力时的“额外工作”，甚至是“本职”之外的一种“学术慈善”甚至是“学术施舍”，就有点本末倒置。与此相似的还有“科普”之说。当社会以文盲为主体时，“科普”是合适且必要的，体现了科学之责和科学之善。但是，今天的中国不仅普及了义务教育，也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社会生活的科技含量不断增加，特别是信息化的发展、元宇宙概念的提出、终身学习社会的形成，整个社会的科技水平会与过去显著不同。关心社会语言生活，满足社会语言需求，已经不是“科普”的意义所能涵盖的。^①

学科评价是连接学术与社会的纽带，学界重视学科评价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学术资源，促进学科的发展壮大，从而使学科能够更好地解决语言学科问题和社会语言问题。但是，如果学术评价体系出了问题，如果学术的评价结果应用不当，对学科建设、学术发展也会产生副作用。现在学科评审、学人评价上存在严重的“五唯”现象，只看发表论文或申请专利的数量，只看文章发表的刊物级别和引用率，而不问提出了什么问题，解决了什么问题。片面追求“学术GDP”的倾向，用“利益化的方式”做科研，造成了学术异化不等式Ⅱ）：

$$\text{II) : } A < B < C$$

这种怪异的不等式，在某些学人、学科团队中有表现，也许会成为学科通病。一位科学家甚至感叹说，

^① 2022年北京冬（残）奥会的吉祥物是“冰墩墩”和“雪融融”，他们的拉丁字母名字分别是Bing Dwen Dwen和Shuey Rhon Rhon。学界无几人可以说出他们“洋名字”的命名之由。由此可以提出“科普”在现代社会的合用性问题。

我们的科学圈里有这样一个怪异的现状：当他（她）有创造力真正能做科研的时候，是在以利益化的方式在做科研；当他（她）做到功成名就，立马会反过来再去做一些真正的科学工作。由此可见破“五唯”的重要性，建立科学的学科评价体系的重要性。

三、从田野、社会到实验室、互联网

语言学总体上看还是个经验学科，需要大量的科学材料作支撑。语言学工作者要深入语言生活，到田野里和社会中去做调查研究，到实验室去做语言学实验，而今还要到互联网这一新兴起的语言田野去。

（一）田野调查

田野语言调查是语言研究的基本手段，也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早在2500多年前，周代就设有调查方言俚俗的“輶轩使者”。他们每年秋收后游走各地，采集民歌、童谣和方言异语，供朝廷考察民情之用。西汉时，给事黄门郎扬雄“常把三寸弱翰，赍油素四尺，以问其异语，归即以铅摘次之于槧”，历时27年，编就世界最早、影响至今的方言著作《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这部书后来通称《方言》。

1956年，新中国的“輶轩使者”^①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汉语方言普查，历时两年多，普查方言点1849个，编写方言概况等综合性调查报告18种，分点调查报告近1200份，普通话学习手册等300多本。还组建7个调查队进行少数民族语言普查，调查了42个民族的50多种语言，并帮助侗（1965年改称壮）、布依、苗、傣、哈尼、佤、拉祜、纳西、黎、载瓦、侗等民族设计了文字方案。这是人们第一次较为全面了解了中国的语言状况。

此后，我国又先后进行了“中国新发现语言”调查、《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调查、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②中国濒危少数民族语言调查、《中国语言地图集》编制、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等。在此基础上，2015年，教育部、国家语委组织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一期建设周期历经5年，参与的高校和科研机构350多家，组建专家团队1000多个，投入专业技术人员4500多名，语言发音人9000多名，完成1712个调查点（包括港澳台在内的全国所有省区市）、123个语种及其主要方言的调查，得到原始音视频语料文件1000多万条，总物理容量达100TB，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语言资源数据库。

田野语言调查今后仍有很多任务。比如我国自2013年开始建设了21个自贸区，2020年开始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2015年逐渐开始了京津冀首都经济圈、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长三角一体化、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跨区域建设，这都需要了解其语言需求，提升其语言能力、制定语言规划以支撑其经济建设。前面所述的田野调查，多是以某一语言或某一方言为对象进行的，其目的是为了了解“语言”自身；而这里所要做的田野调查，是以一个区域的语言、方言为调查对象，其目的是为了通过处理语言问题、发挥语言作用来促进自贸区（港）和跨省域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这种可称为“区域语言学”的语言调查，其调查的方法手段、调查内容、调查目的都有颇多特殊性。至于边境语言调查以助成边睦邻、一带一路语言调查以助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跨境的和国际区域的田野语言调查，还是中国当代輶轩使者较为生疏但也更为广阔的学术田野。

语言学的田野，其实不限于语言和方言的调查。考古文献的整理，文献中的例句搜集，语料库语言学的语料搜集与建库，社会语言学的社会调查，实验语言学的语言实验室等，都是语言学的广义田野。语言生活和语言学涉及的各种场地，都可视作语言学的田野，只不过随着研究方法的精进和语言学的发展，一些“田野”逐渐被分割出来而已。

^① 参见戴庆厦. 语言国情调查的理论与方法问题 [J]. 语言政策与语言教育, 2015, (1): 56-70 + 116; 李宇明, 王莉宁. 輶轩使者: 语言学家的田野故事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0. 收集了新中国“輶轩使者”的一些故事, 也可参看。

^② 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资料 [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06.

（二）社会语言调查

随着社会语言学的发展，“方言”的概念不再只指地域方言，也指各种社会人群的语言特色，甚至可以包括语言态度、语言认同、语言需求等。社会方言所涉及的人群早年主要指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等，而现在可以涉及各种社会身份。社会语言调查不仅可以进行社会方言的调查，也可以调查语言与社会的各种关系，常用的调查方法除问卷法、访谈法之外，也使用文化人类学的“实地参与观察法”，也会根据调查对象和目标进行特殊的方法设计。有些学者设计的方法之精妙，让人拍案叫绝，成为后人研究的经典方法，如拉波夫（William Labov）1966年报告的纽约市百货公司的社会分层调查方法，1960年兰伯特（Wallace E·Lambert）为测试语言态度而创立的“变语配对法”等。

社会语言调查，可以获取书本上得不到的资料，可以对语言生活做出独到的观察，可以为语言学做出独特贡献。比如，郭熙主持的“海外华语资源库”从2017年开始立项建设，重点采访有声望的海外华人华侨老人，请他们讲述华语传承及亲历的华人华侨故事，他们的故事及叙事语言本身，都是带有抢救性的华语资源。目前课题组利用各种机会，访问了33个国家和地区的270位人士，年龄最长者93岁，平均年龄73岁以上。这个资源库的建设已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海外华语资源的抢救性搜集与整理”，将对华侨华人华语研究做出独特贡献。

李宇明的《人生初年》^①，用日记法记录了一名中国女孩0~6岁多的2200余天的语言发展，近百万字，被誉为“一个动物人到社会人的全景式记录”^②。父母观察孩子的“日记法”，是比“实地参与观察法”更为深入细致的观察法。《人生初年》不仅是对婴幼儿语言发展时间最长的观察，也是家庭语言教育实验录，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的掠影。最近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发扬中华民族重视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引导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促进未成年人全面健康成长。家庭是第一个课堂，家长是第一任老师。儿童发展最重要者是身体、心智和语言，言传身教是最为基本的教育方法。要发展好儿童的心智与语言，要发挥好“言传”的最大成效，必须了解儿童的语言发展规律。

再如赵春燕的《乡村振兴视域下理塘县中扎村的语言生活》^③，是对四川省理塘县中扎村语言生活的研究。中扎村是一个藏族乡村，作者与村中一位归国藏胞有师生关系。这位藏胞回乡创业，作者于2019年7月曾随其住进中扎村，进行过为期10天的试调查，颇得村民信任。两年后的2021年7月，作者再赴中扎村进行了20多天的实地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两次考察共访谈了36位藏族村民，采集了52段访谈录音资料（其中最长的326分钟），获得了96份语言景观资料和31份观察日志，获取了中扎村语言使用、语言态度、语言困境等一手资料，对藏族乡村的语言民生、语言教育、乡村产业的语言问题等有了深入的切身了解，特别是因语言不通引发的出行难、看病难、维权难等最让村民忧心的语言问题，感同身受。研究者对中扎村的实地观察，认识到社会是一个语言市场，信息就是力量，对乡村振兴中如何发挥语言作用、扫除村民的语言文字障碍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三）语言实验室

语言的说与听，涉及发音器官和听觉器官的生理运动，与生理学相关；语言的理解与脑神经机制等相关；语言通过空气传播，与声学相关；因盲、聋、智障、自闭症、阿尔茨海默病等引发的语言障碍，与病理学、心理学相关。语言的属性决定了语言研究不能只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事情，也牵涉到理学、工学、医学等科学门类。特别是随着语言信息处理和互联网的发展，语言学与信息化的关系异常密切，计算语言学发展为一个新学科，语料库的建设、计算机文字识别、计算机字库设计及其调用、字符显示与文字输入、语音识别与合成、文本检索与信息抽取、自动翻译、机器写作、机器语言行为识别等，都是计算语言学的重要内容。语言学已经是一个横跨人文社会科学和理工科学的“大学科”，应该建立各

① 李宇明. 人生初年——一名中国女孩的语言日志（上、中、下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② 见郭熙为《人生初年》所做序言。

③ 赵春燕. 乡村振兴视域下理塘县中扎村的语言生活 [J]. 语言战略研究, 2022, (1): 36-47.

种语言学实验室。

学界先行者对此早有认识。1950年,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成立之时,就设立了语音实验小组,发展到今天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语音与言语科学重点实验室”;1985年,国家语委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就成立了“计算语言学研究室”;1986年,南开大学文学院成立语音实验室;2001年,南京师范大学成立语言科学与技术系;2005年徐州师范大学成立“江苏省语言科学与神经认知工程重点实验室”。这都是早年文科成立的语言实验室一类的科研机构,现在当然是更多了。理工医科与语言相关的实验室恐怕也不在少数。

但总体上看,语言学是由传统的语文学发展而来,学科设置在文学门类中,研究人员的学科背景多为文科,“语言实验”的意识不浓厚。但是,随着语言科学的发展,没有实验室的语言学,没有浓厚“语言实验”意识的语言学,没有从事实验的语言学研究人员,语言学要满足当今社会需求、成为科学共同体的称职成员、得到不负时代的发展,是十分困难的。

(四) 互联网

互联网已成为语言学研究者的新田野。2012年,南开大学《实验语言学》创刊,笔者曾与创刊主编石锋教授交流,羡慕他早早把学术方向转向实验语音学,还成立了语音实验室,又创办《实验语言学》杂志,语言学不仅要走向田野、走向社会,还要走向实验室。2021年11月,笔者应邀为他主持的“实验语言学+”云上论坛做报告,我们两个又“旧话新说”,认为语言学还要走向互联网。很快《实验语言学》期刊网页上就有了这样的话:“新时代的语言学者要走向社会,走向田野,走向实验室,走向互联网。”我在演讲中,把这个网页的截图放在PPT上,以为响应之举。几乎同时,罗仁地(Randy J. LaPolola)在“2021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交叉学科前沿论坛”上做《论学科交叉融合在研究语言与科技时的必然性——走向以人为中心的研究》的主旨报告,报告的结尾是,新时代的语言学研究要“走向社会!走向田野!走向实验室!走向互联网!”

随着互联网和语言智能的发展,互联网上的语言生活越来越丰富,越来越重要。书刊、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迁移到网络上,伴随网络也产生了微博、短信、微信、微视频等各种新媒体。现今的网络具有“全媒体”性质,人类以往创造的所有信息负载方式都可以进入互联网,而且全媒体又逐渐发展为“融媒体”,人类进入一个全新的媒体时代。

网络上存在大量的且与日俱增的语言资源,这些语言资源有许多是田野调查和社会调查不能获得的,甚至语言资源的性质也有所不同。^①网络产生着大量新的语言现象,产生着现实生活中鲜有的新的语言生活功能,出现许多新的语言需求和新的语言问题。这些新现象、新功能、新需求、新问题值得特别研究。网络空间成为此前任何时代的轺轩使者都未曾见识过的新田野,而且也是最为富饶的田野。如何利用互联网发展语言学,语言学如何促进网络语言生活的和谐进步,都是当代轺轩使者要回答的时代课题。

四、中国语言生活的研究优势

中国语言生活研究,已经产生了一些理论成果,并推动了中国语言规划的实践发展,促进了中国语言生活的进步。就全球语言生活而言,中国语言生活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

(一) 具有中华特色

中国语言生活具有自己的诸多特色,是语言科学研究不可多得的材料。试举例如下:

第一,语言关系处理。中国有56个民族100多种语言,跨境语言有54种(按照国外的语言标准有

^① 2000年,Widdowson(威窦森)在他的论文The limitation of linguistics applied(《语言学应用中的局限性》)中提出,自己根据“自省”得到的数据是“第一人称数据”(first person data),使用“问卷调查”之类的“诱导”得到的数据是“第二人称数据”(second person data)。语料库数据,语言研究者不再充当数据的提供者或诱导者,而是充当数据的观察者或检验者,是“第三人称数据”(third person data)。见冯志伟.关于“第三人称数据”的观察和检验[A].陆晓蕾,倪斌.Python 3:语料库技术与应用[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20.

90 来种, 这些数据还不包括邻海国家的跨境语言)。历史上和近现代在处理汉语各方言、中华各语言以及跨境语言的关系上, 在减少语言矛盾与冲突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第二, 语言与文字关系的认识。中国自古以来形成了“重视文字”的语言意识。汉字在语言生活中的地位十分重要。汉字由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到楷书的历史演化以及清末以来汉字的改革、整理、简化, 都是世界其他国家难以同比的现象。语言与文字的关系, 也只有通过汉语汉字才能得到很好解释。

第三, 古今语言的关联。中国有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 这些文献都是用楷书汉字或可转化为楷书汉字保存下来。文献的连续性使得古今汉语之间、文言文与白话文之间没有鸿沟, 语言表达可文可白、可雅可俗, 古代的词语、成语、典故可以顺利引入现代汉语, 词语的内部构造常需借助古代汉语解释, 这对汉语的学习、运用和计算机语言处理, 都带来了独特问题。

第四, 普通话的推广。中国历史上的语言统一主要是书面语的统一, 口语的规范和统一是从清朝末年年开始提出, 历经 130 来年才逐步实现的, 当前普通话普及率已超过 80%。中国人口世界最多, 汉语方言分歧巨大, 民族语言众多, 东西部的经济、教育条件差距很大, 世界上不少国家推广国语都没有如此的普及率, 甚至还出现不少的矛盾冲突。中国推广普通话的理论、实践及其对国家认同、国家进步发挥的作用, 都是人类的语言奇观。

第五, 海外华语的传承。华人华侨走到世界各地, 也把华语华文中华文化带到世界各地, 并在一些地区形成了有特色的地区变体, 在北美和欧洲正在形成新变体。华语向世界的传播传承方式及未来前景, 与英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俄语等的海外传播皆不相同, 有其独特性。

(二) 某些领域某些方面具有先进性

中国的语言生活, 不仅有许多方面体现中华特色, 而且也因为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 使有些语言生活具有国际先进性。例如:

第一, 语言扶贫。2021 年 2 月 25 日, 中国宣告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 现行标准下 9899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832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 12.8 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 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 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在中国减贫脱贫的道路上, 语言发挥了重要作用。2016 年, 教育部、国家语委制定了语言扶贫规划, 学界、社会积极行动, 深入我国贫困地区开展语言教育, 传播脱贫致富科技, 推广现代语言技术。这条扶贫的语言大道是负载知识、信息与机遇的大道, 具有提升语言能力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特效功能。语言可以扶贫, 源自语言与教育的密切关系, 源自语言与信息的密切关系, 源自语言与人与互联网的密切关系, 源自语言与人的能力和机会的密切关系。在语言扶贫事业中, 中国学人认识到语言与贫困的理论关系, 认识到语言作用于贫困或经济发展的机制与规律, 这些理论与实践经验, 可以引入当今的乡村振兴成就美丽中国的新事业中, 也可以为人类消灭贫困贡献中国智慧。^①

第二, 应急语言服务。己亥与庚子之交, 新型冠状病毒突袭中国, 为害世界, 后又有德尔塔、奥密克戎病毒变体, 对人类的政治、经济、生活都造成极大影响。疫情刚一发生, “战疫语言服务团”无召而成伍, 利用湖北“语保”资源, 利用微信、微视频、融媒体、即时翻译等现代语言技术, 利用网络隔空发力, 迅速制作《抗击疫情湖北方言通》支援抗疫一线。面对国际新冠肺炎疫情日趋严重的新局面, 又紧急研发《疫情防控外语通》《疫情防控“简明汉语”》等系列产品向在华来华留学生和外籍人士提供疫情防控的语言服务。2022 年 4 月, 国家应急语言服务团正式建立, 正积极开发语言应急产品, 开展应急语言服务教育、应急语言研究等。中国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语言应急服务, 产生了许多经验和理论探讨, 把应急语言服务概括为三大任务: (1) 语言沟通, 用各种语言及其变体保证救援现场、事件影响域的信息沟通; (2) 语言抚慰, 包括涉事者的语言抚慰和大众群体的语言抚慰; (3) 急情预警, 利用互联网、

^① 李宇明. 语言扶贫问题研究(第一辑)[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9; 李宇明. 语言扶贫问题研究(第二辑)[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0.

大数据进行灾情、疫情等语情预测。新冠疫情是灾难,但在抗疫中推进了中国应急语言服务的发展。^①

第三,网上语言生活。20多年来,中国互联网事业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已拥有全球最大的信息通信网络,形成了全球最为庞大、充满生机的数字语言生活。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32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3%,在线办公、在线医疗、网上外卖、网约车的用户规模增长显著,网络信息搜索、网络新闻、网络购物、网络娱乐、网络直播、网络音乐、短视频等构成了数字社会新的语言生活方式。

第四,语言数据的重要地位。2019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把数据与“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并列为第七大生产要素,可以通过市场“按贡献取酬”,这是重大的理论创新,体现着对信息化社会的本质认识。进一步分析数据可以发现,80%的数据都是“语言数据”,因此,语言数据具有生产要素的性质。充分发挥语言资源生产要素的作用,支持数字经济发展,需要研究语言数据的经济属性,建立语言数据产业,发展与之相关的语言职业;需要全面加强语言资源的治理,建立语言数据集聚、管理、标准、产权、共享、取酬等若干方面的准则,促进语言数据的生产与市场流通,使其发挥最大作用。^②

此外,中国在语言生活监测、语言保护等方面,无论其规模、方法还是所取得的社会成效与学术成效,在国际上也具有领先性。

(三) 学术话语权

具备一定研究条件之时,研究对象往往决定研究水平的高低。中国语言生活具有如此多的中华特色,特别是有许多方面许多领域甚至具有全球领先性。对这样的语言生活进行研究,能够发现大量的科学事实,发现这些事实背后的各种规则,解释其成因,预测其发展,提出许多原创性的概念、理念及理论成果。这些原创性的概念、理念、理论可对他人研究提供参照与借鉴,甚至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推进人类这一领域的科学进步。

同时,这种把语言生活作为研究的出发地和研究成果归宿地的学科理念,通过学术研究推进语言生活进步的学术观念,或曰“语言生活理念”,具有“科学学”的价值,对其他同行、对其他学科具有借鉴价值。

科学发展是人类进步的重要表现,也是推进人类进步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是在国际上拥有话语权的一个方面。发展原创性的科学研究,为人类科学共同体多做贡献,是我们这个时代应有的学术追求。

五、结 语

中国语言生活的研究及其对中国语言规划事业的学术支撑,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学术现象。它把解决社会发展中的语言问题作为学术的出发点、验证处和归宿地,提倡学者到田野里、到社会中、到实验室、到互联网上去调查语言现象,去发现、研究和解决语言问题。不片面追求学术GDP,重视学术成果对本学科的学术提升力、相关学科的学术穿透力和对社会的学术影响力。

中国语言生活是语言学的学术沃土,有许多方面独具中华特色,如妥善处理国家通用语言与方言、民族语言的关系,处理古代语言较自由进入现代语言的问题,强烈的“文字意识”及处理语言与文字的关系,普通话推广的成效与经验,海外华语的传播传承等;也有许多语言生活具有国际先进性,如语言生活监测、语言资源保护、语言扶贫与乡村振兴、应急语言服务、网上语言生活、语言数据的充分利用等。研究这些语言生活,可以观察到特殊的语言生活现象,发现制约其存在与发展的规律,对这些规律进行科学阐释,得到原创性的概念、理念、理论,创发新的研究方法及研究手段,形成新的研究范式等。

① 李宇明. 应急语言问题研究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0.

② 李宇明. 数据时代与语言产业 [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5): 87-98; 李宇明, 王春辉. 从数据到语言数据 [J]. 语言战略研究, 2022, (4): 13-14.

中国的国际作用日益增强，但是在国际话语权领域依然有一些待补的弱项，在国际学术领域的弱项更为明显，比如中文出版物对国际科技成果的负载能力，中国学界的学术理论、学术范式的创新能力和学术话题设置能力，中国学界与国际学界平等对话的能力、中国学界为人类科学共同体的贡献度等，都与中国的大国形象、大国地位不相称。中国学者要在“跟跑”和奋力急追的同时，更要重视原创性研究，特别是要增强学术自信，不断增加国际学术声誉和学术贡献。

当然，也不能将学术视野囿于学科，囿于国际学术界，更要重视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当前语言生活发展变化迅速，语言对社会各领域的影响越来越大，语言矛盾越来越复杂，语言冲突时有发生，而且关心语言问题的学科也越来越多，语言学必须重视社会发展中的语言问题，重视其他学科关于语言的研究，学术成果既要“内向”用于学科进步，更要“外向”用于改善语言生活，推进社会进步。中国从古代走到今天，世代都有一部传奇的语言文字故事，中国的轺轩使者更要讲好当代的语言文字故事。

The Study of Language in Social Life and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Linguistic Research in China

LI Yuming

(*Beijing Advanced Innovation Center for Language Resources/ Faculty of Linguistic Sciences,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100083*)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levant concepts and achievements of Chinese studies on language in social lif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solving language issues in social development ought to be the driving force, validation criteria, and ultimate purpose of linguistic research. The paper advocates that linguists need to investigate language-related topics through various channels, in fieldwork, by surveys, at laboratories, and on the Internet to discover, examine and cope with language issues. In addition, linguistic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absorb and integrate the research on language in related disciplines, making contributions to building a scientific community. To better solve the issues in social development, our society establishes and supports relevant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guided by evaluation system. However, non-scientific evaluations such as “five-only” only brings a great negative impact on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as many scholars choose to pursue their “research GDP” at the sacrifice of forsaking the true meaning of scholarship. The evaluation of disciplines and scholars should mainly be based on the problems they raise and solve, as well as the role of their research in shaping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disciplines and the whole society. Language situations in China hav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Chinese linguistic research carries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mission. Chinese scholars are already at the forefront of the world in some fields of linguistic research. The paper is closed by addressing the importance of taking the language situations in China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improving language-related social life in China and calling for more original concepts, ideas, theories and research paradigms to prosper language sciences and advance social progress in China.

Key words: language in social life; mission of linguistics; discipline evaluation; originality in academic research

(责任编辑: 杨 恬)